

建國以來我國圖書館推薦目錄工作的評述

廖 延 唐

我國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隨着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推薦目錄的工作也在逐步地開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很多公共圖書館都進行了這一工作。

圖書館的推薦目錄工作是一件細緻而又繁重的工作。目前我國圖書館中編制推薦目錄的人材還很缺乏，但有些公共圖書館如山東省、上海市等圖書館都積極地進行了這一工作，並且已經摸索出了一些經驗。這說明，我國有些公共圖書館對推薦目錄教育人民羣眾的積極作用，已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

圖書館的任務是在以豐富的圖書資料為教育廣大人民羣眾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些任務的完成，書目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

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發展，廣大人民提高科學知識和文化水平的要求日趨迫切，圖書館在完成提高人民科學知識和文化水平的任務中，必須進行相適應的推薦目錄工作。為什麼要這樣做？

1. 公共圖書館接觸的讀者面很廣，讀者所提出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若由館員一一地來回答，在時間上和水平上都是不可能的；同時，在許多讀者所提出的問題中，有時是帶有普遍性的，因此就要求圖書館編制帶有普遍性問題的推薦目錄，以便使館員能夠很好地回答讀者的諮詢。

2. 公共圖書館的讀者是多種多樣的，如水平不同、愛好不同等等，這就要求圖書館來滿足讀者要求的多樣性。在滿足讀者這些不同的要求時，圖書館的卡片目錄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但它却不能及時地、完善地解決讀者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卡片目錄的局限性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例如，卡片目錄只是反映本館藏書，對於報章雜誌的論文則不能及時地反映到目錄中來；卡片目錄雖然也可以集中反映某一門類的書籍。但所反映的書籍深淺程度不一，不便於讀者挑選；卡片目錄不可能廣泛用在館外作為書籍宣傳的工具等

等。因此，必須編制推薦目錄。

推薦目錄的巨大意義還在於它以最新的科學知識和適合於廣大羣眾需要的現實的書籍，及時地在羣眾中進行宣傳和教育。所以推薦目錄的發展，也反映了我國科學文化的豐富性。

推薦目錄所反映的是最現實的，最有思想性和最有教育意義的書籍。因此，在編制時應挑選最優良的書籍，從而集中地、概括地說明所要推薦的主題。在這裡就要求把有關這一題目的馬列主義著作、黨和政府的決議和領袖的言論首先加以推薦。

編制推薦目錄還必須注意它的用途和推薦的對象，只有在明確了用途和對象以後，才能夠選出為讀者所歡迎的，並能為讀者所理解的有益的書籍，推薦目錄也才能夠達到它教育讀者的積極作用。

幾年來，我國公共圖書館為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曾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推薦目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在編制方法和內容上也在逐步改進。據不完全的統計，自1951年至1955年10月，各圖書館已經出版的目錄參考資料有262種，其中推薦性目錄有70種。

北京圖書館自1951年以來很重視這一工作，曾編制了不少推薦目錄，其中有許多是結合紀念性展覽會、講演會和報告會而編制的，如“馬克思誕生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展覽”、“孟德斯鳩逝世二百週年”、“安徒生誕生一百五十週年”等。這些推薦目錄對教育讀者都起了很大作用。

山東省圖書館在推薦目錄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編制方法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經驗。該館為了更好地對讀者進行輔導閱讀工作，曾有計劃地進行了推薦目錄的編制工作，計先後編制了推薦目錄十多種，讀書計劃數十種。推薦目錄涉及的范围也比較廣，有為幹部政治理論學習而編的，如“學習聯共（布）黨史”各章推薦書目、“我國發展國民經濟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学习政治经济学”等推荐目录；有为辅导农村读者而编制的，如“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怎样当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学习积肥、保肥和施肥”等推荐目录。这些目录都积极地配合了读者的学习并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上海市图书馆在推荐目录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例如在配合农业合作化时编制了“农业生产管理工作”、“农村党团组织工作”等推荐目录；在配合肃反运动时编制了“红色保险箱”故事会推荐目录；为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也编制了一些推荐目录，如“工厂通俗读物介绍书目”等。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都进行了推荐目录的编制工作。如上海图书馆所编分辑出版的“图书目录”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新文艺作品、苏联文艺作品、高尔基著作等。南京图书馆和江苏省文艺、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了多次的文艺讲座和报告会，并结合这些活动也出版了一些推荐性目录，如“海鸥”、“西厢”等；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也编制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推荐目录。湖北省图书馆为配合农业合作化曾编制了“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推荐目录。

从上述情况看来，我国各图书馆对推荐目录的工作已有了相当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还很年轻，各图书馆对推荐目录的编制尚缺乏一套有系统的办法，同时，书目协调工作还缺乏，因此，在推荐目录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有必要指出，各图书馆所编的目录参考资料，一般都是参考性目录多于推荐性目录，文艺书籍目录多于其他门类书籍目录。据——1951年至1955年10月的262种书目材料看来，有130种是属于参考性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图书馆所编的79种书目，其中有62种是属于参考性的；上海图书馆所编的40种书目，其中十九种是属于文艺性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所编的17种书目，其中有十种是文艺性的；南京图书馆所编的48种书目，其中18种是文艺性的。

产生参考性目录多于推荐性目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图书馆的目录工作，一开始就和国民经济建设紧密地配合着，为了满足有关部门的需要，图书馆编制了各种有关文献资料目录。从图书馆

的基本任务来说，这当然是对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图书馆对自己本身的方针任务不够明确，因而忽视了图书馆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能动性，没有认识到推荐目录在提高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去年在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所提出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图书馆事业有两项基本任务，一项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流通图书，传播马列主义理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动员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积极性；一项是向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同时指出：两项任务有时可能强调某项，但二者都不应有所偏废。图书馆如果要很好地完成前一项任务，推荐目录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打破图书馆工作的“墨守成规”，加强图书馆与读者的联系，加强图书馆在读者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

图书馆过多地编制文艺书籍目录，是由于对满足读者要求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图书馆不能因为满足读者需要而放棄了图书馆工作的能动作用必须注意读者阅读趋向而有意識地加以閱讀上的指導。

关于纠正过多编制文艺书目的问题，希望今后各图书馆除了配合講演会、报告会和提高读者阅读能力而编制文艺书籍推荐目录外，不要过多地编制一般性的文艺书籍目录。文艺书籍的宣传可以结合政治学习和群众性运动来进行宣传，如山东省图书馆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推荐目录中，就宣传了“索特”（列昂诺夫著、董秋斯译）、“时间呀！前进”（卡达耶夫著、林淡秋译）等文艺书籍；南京图书馆在“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推荐目录中，就推荐了“勇敢”（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著）、“海鸥”（尼·比留柯夫著）等文艺书籍；湖北图书馆在“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推荐目录中，就推荐了“不能走那条路”（李准著）、“运河的桨声”（刘绍棠著）、“春种秋收”（康濯著）等文艺小说。这样，一方面文艺书籍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学习和群众性运动，另一方面，也使文艺得到多方面的反映，打破了文艺书籍宣传形式上的呆板化，同时，也使其他较为理论的推荐目录形式更为多样化，内容也更加充实、更加活跃了。

编制推荐目录的基本要求，在于所编目录能反

映现实，所挑选的书籍富有思想性和指导性，而且符合读者的文化水平。也就是说，所编的目录要能产生启发读者和教育读者的作用。要达到这一基本要求，推荐目录的编制方法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兹分以下数项来讨论我国图书馆所编制的推荐目录：

1. 主题问题

主题是推荐目录中书籍所阐述的中心问题，也是读者所阅读的中心内容。推荐目录的主题应积极地反映现实生活，应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教育来确定主题。在确定主题前必须研究读者，了解读者的爱好，这是推荐目录能发生作用的重要基础。主题确定后，表现主题的方法是很重要的，题目的名称必须明确具体，能够反映出主题的目的。要用文艺手法来进行题目的拟写，使题目具有吸引力，绝对要避免题目的说教式和含糊不清。

我国各图书馆编制的推荐目录，有的主题的选择和表现手法都是很好的，有的还存在着问题。如山东省图书馆编的“做一个坚强的更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管理办法和它的优越性请读这些书”、“从苏联文艺作品中看苏联人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如湖北省图书馆编的“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这些主题都富有现实意义，也很明确，题目都不含糊生硬。他如山东省图书馆编的“充实天文知识”、“请阅读有关我国集体农庄和农场的书”、“斯大林全集与选集”，这些主题的选择和拟写，就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个题目显得太平板，没有吸引力。第二个题目显得含糊不清，也缺乏吸引力，因为这样一个笼统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办法给读者一个鲜明的概念；此外，从题目上看，似乎是有关我国农庄农场管理的书，而目录里所列举的只是五本小册子，一共只有145页书的内容，而且都是介绍性的。编者要读者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去读这几本书有什么大的意义呢？第三个题目是更加笼统了，编者还不厌其烦地著录了六卷斯大林全集，还有些选集。这样的题目很难在读者中发生作用，因为这个主题没有触及到任何具体问题。就是馆员本身在利用这个目录时，也难以明确推荐对象。

2. 用途和对象问题

我国过去各图书馆编制的推荐目录，比较突出的缺点是用途和对象不明确。推荐目录的用途和它

推荐的对象是否明确，决定了推荐目录的使用程度。一种推荐目录，不可能既适合于专家又适合于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如果目录里有深浅相差悬殊的书籍，这种目录的推荐意义就不大，读者的收益也小。

我国图书馆过去编的推荐目录很多有上述毛病，如湖北省图书馆编的“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这个目录选书是比较精要的，一般的都符合推荐对象的要求，但其中也有过于深奥和没有必要收入的书，如在收益分配和财务工作一项中，推荐了于光远等编的“论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一书，按这本书是着重从经济理论方面来分析研究农业生产合作社产品分配的某些客观规律，产品分配的形式、实质，各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和产品分配与再生产问题的。这种书纯粹是研究性的，决不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农民群众所能理解。又如在同一项下收入了“北京市蔬菜产销结合的經驗”一书，按这本书是分析北京市蔬菜产销矛盾的，并提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这本书对城市解决蔬菜问题有参考价值，对农民来说也用不着去研究这问题。像这类书籍收入这个目录，显然是不符合本目录推荐对象的需要的。

山东图书馆编的读书计划和推荐目录在用途和对象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该馆编的读书计划“怎样学写作”，看来是给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初学写作者用的。但在这个目录里介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十六种书籍，另外还有文艺报上的两篇论文，十六种书籍两篇论文加起来共有3087页，这样庞大的数字，叫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怎样能完成这个计划呢？即就该目录中“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王瑶著，共583页）一书来说在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里，就需要学一年时间。还有目录中的“新文学教程”（维诺格拉多夫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都不是初学写作者一下就能理解的。

在该馆编的推荐图书简目第六种第一分题“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目录里，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起，中间有“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共三十三部大著作，里面是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无所不包，可以说，没有一个读者能适用这个目录，因为一个具有初步古典文学知识的人，不可能从这个目录里得到什么具体的启发，而一个具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人，遇这样一个对各专题研究门类（如“论语”、

“庄子”、“孟子”等)只列一个書名,又有什么大的帮助呢?在第六种另外十三个分題內(如“西遊記”吳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都分別收集了各分題的資料,更在第一分題中又把其他分題的書籍,如“西遊記”(吳承恩著)、“儒林外史”(吳敬梓著)、“紅樓夢”(曹雪芹著)又重复著錄了一遍,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每个分題下面,所介紹的書籍論文深淺也是很不一致。在“水滸傳”这个分題下面,有登在中國青年報上的对水滸傳作一般介紹的文章“談水滸”(載不凡作),也有專門論著,如“論金聖嘆評改水滸傳”(何滿子作,115頁)、“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錫作,80頁)。这种情况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在一个分題下面,所收的論文,很多是爭論性的,於是,在推荐目錄里就出現了有这样意見的文章,也有那样意見的文章,如“談談水滸”(張默生,西南文藝,55:3)、“对張默生先生談談水滸的意見”(賀明远,西南文藝53:12)、“对賀明远同志的文章的几点意見”(張默生,西南文藝,53:12)。这种情况在其他分題內还是有的。在推荐目錄里收上这样多的爭論文章,就变成参考性目錄了,但就参考目錄的要求來說,这几篇文章又顯得太少了,这样一來目錄的作用就不大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編者在編制推荐目錄时,沒有很好的考慮目錄的对象和用途。推荐目錄應該有明确的对象,所选的書籍不能超过对象的閱讀能力。不能設想,一个推荐目錄既適用於專家,又適用於一般文化水平的讀者。由於目錄的用途不明,对象不清,目錄輔導讀者的效果也就大大地降低了。

3. 选書問題

选書問題是和推荐目錄的对象、用途問題緊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明确了推荐对象、了解了他們的兴趣、需要和文化水平的基礎上,才能精确地、有目的地挑选圖書。在沒有熟悉圖書和了解讀者以前,所推荐的圖書必定是距离讀者的需要很远的。

我國各圖書館編制的推荐目錄,在选書問題上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标准,对推荐目錄必須首先反映馬列主义經典著作这一点也注意得不够。如山东省圖書館編的“斯大林著作及闡述斯大林學說”,便沒有反映毛主席的“最偉大的友誼”一文。上海圖書館、山东省圖書館、济南市圖書館,在編制“培养青年共產主义道德品質”推荐目錄和讀書計劃时,

列寧关于青年共產主义教育的經典著作“青年团的任务”一文都沒有收入目錄和讀書計劃中。

从有些目錄看來,編者只是在發現書名与所推荐的主题差不多就收入目錄中了,至於書中的內容是不是重复,版本是不是新的,書中的內容深淺如何,這本書的主要用途如何,就很少去考慮,以致造成目錄內圖書內容重复,深淺程度相差懸殊,版本陈旧等現象,这些現象都降低了推荐目錄的積極作用。

山东省圖書館編的“斯大林著作及闡述斯大林學說”書刊簡目中,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在該書目的第五分題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中,編者挑选了八本書和五篇雜誌上的論文。第一种書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干部必讀),是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它包括了其他七种書的全部內容,而“論中國革命前途”、“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务”、“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談話”、“中國革命問題”四文,除在本目錄的四个彙編本中反映了四次以外,还著錄了單行本,使这些文章一連反映了五次,这就顯得有些煩瑣了。第一种彙編本“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於1953年印了第三版,其中有些文章經曹葆華、張仲實校譯过,這本子顯然比1950年解放社版好些,而編者却沒有选入。

在选入的五篇雜誌論文中,“斯大林对中國革命理論的偉大貢獻”(張如心作),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出了單行本,“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的廿五週年”(陳伯达作)一文,在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和中國革命”(陳伯达作)一書中已經收入,編者沒有著錄單行本,而光和雜誌的卷期打交道,这样反而給了讀者很多不方便。

在选好書的問題上,編者收了陳伯达作的“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的廿五週年”,而他作的“斯大林和中國革命”一文,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被編者选入目錄。还有胡華作的“學習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1951,北京青年出版社)一書,是專門論述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學說的,而編者也沒有选入目錄。最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斯大林著作及闡述斯大林學說”書目的十个分題中,列举了一百多种書籍和雜誌論文,而最能總結斯大林革命學說和斯大林一生功績的經典著作“最偉大的友誼”(毛澤東著)却沒

有收入这个目錄。

在“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推荐目錄中，“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著，解放社，127頁）、“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外國文書籍出版局，200頁）、“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華東新華書店，90頁），這幾本書本身就有重複，而這幾種書在1950年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全都包括了，而編者却沒有收入“列寧主義問題”一書。

在推荐圖書簡目“培養青年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第一分題中，過多地收入了專論性的書籍，如“論新愛國主義”（伐西利耶夫等編，489頁）、“愛國主義論集”（廖蓋隆著，225頁）等。在第三分題“集體主義”中，編者收集了七種書，而對這個主題最適用的書籍“集體的力”（庫爾舍夫著，丹明譯，1953，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02頁）都沒有選入。在“培養青年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目錄的五個分題中，共收了廿九種書，其中一本富有教育意義的對培養青年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有積極作用的文藝小說也沒有。如果減少些專論性文章，增加些文藝小說，如“把一切獻給黨”（1954，北京，工人出版社，吳運鐸著，206頁）“青年英雄的故事”（左林等著，1954，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84頁）等書，不是更生動、更全面了嗎？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推荐目錄的編者是在沒有很好地了解讀者 and 熟悉圖書的情況下進行選書工作的。在“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推荐書目中，編者只是盡量地介紹了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各種中譯版本，而對推荐目錄的選書原則注意得不够。編者對所推荐的書籍沒有很好地查閱，甚至連每本書的目錄也沒有詳細地看一下，以致有些文章重複了好幾次，這從推荐目錄的角度上看，根本沒有必要。對於書籍出版的情況編者也是不很清楚的，以致造成新版書和對推荐主題合適的書以及有單行本的書沒有被選上，而只著錄了舊版書和論文所在的雜誌卷期。當然，不能要求每個圖書館員能熟悉哪類圖書有些什麼新版本，有些什麼舊版本，但圖書館員必須學會利用圖書館、出版部門和發行部門的書目參考材料。這樣，推荐目錄所選的書才能“精”而“簡”，才能達到真正輔導讀者，教育讀者的目的。

上海圖書館編的圖書目錄“青年修養讀物（甲乙冊）——培養共產主義道德”，所收的書範圍較

廣，不只限於專論性的書籍，也有文藝小說，英雄人物事蹟的故事，這是好的地方，但在甲乙兩冊的附錄參考書目中，所列的十種書籍全是重複的。編者在出版說明中說：本書目分甲乙兩種，甲種收錄的書較淺，乙種比較深一些。而在附錄中編者又沒有遵守這個原則。如果把附錄里的書也按深淺分一下，省出些篇幅，再推荐幾本合適的書，不是更豐富了嗎？

4. 排列和著錄問題

推荐目錄特別是讀書計劃中書籍的排列和著錄是否完備合理，是很重要的問題。推荐目錄內書籍的排列最好是按書籍的內容，如湖北省圖書館編的“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那樣。當然也還可以利用其他原則進行排列。讀書計劃中書籍系統的排列，對讀者進行系統的閱讀有很大關係。讀書計劃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讀者使讀者獲得知識，另一方面也幫助讀者獲得系統閱讀的技能，在這裡，書籍的系統排列就更顯示出它的重要了。

圖書排列的系統性，要根據讀書計劃的主題和圖書的內容來確定排列的原則。一般的原則是由淺到深，由簡到繁，由總括論述到具體問題或由具體問題到總括論述，有時根據圖書內容也可以按年代排列。

我國公共圖書館在讀書計劃書籍系統的排列上，是作過很大努力的。如山東省圖書館編的讀書計劃“做一個堅強的更有益於人民的人”、“充實天文知識”等，是按照由總括論述到具體問題和由淺到深的原則排列起來的；上海圖書館編的“培養青年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讀書計劃，也是按深淺的原則排列的。

推荐目錄的著錄是使目錄精確、簡練和說明問題的不可缺少的一環。我國公共圖書館在推荐目錄的著錄上有的地方顯得煩瑣，而有的地方又不够說明問題。

前面提到過的山東省圖書館編的推荐書目“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著錄了八種書，其實只要著錄第一種“列寧斯大林論中國”（解放社）就可以了，其他七種有的可以不著錄，有的可以在附註中說明一下還有什麼版本可作參考。空出來的篇幅再選上幾種書，目錄不是更豐富了嗎？在“斯大林全集與選集”推荐書目中，編者不厭其煩地一連著錄了六本斯大林全集，如果只著錄一行，在附註中說明一

下現已出版了那几卷，不是很清楚嗎？空下來的篇幅編者就可以更多地收集些有关文章了。

推荐目錄著錄的事項，要力求詳細，最好是有索書号、書名、著者（包括譯者）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數頁、提要。这些項目的著錄，对讀者了解圖書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必須說明的是圖書館为某些讀者羣而編制的推荐目錄是必須著錄索書号的，如果是大型公共圖書館編制的指導性推荐目錄，是供給各館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利用的，这种目錄就可以不著錄索書号，因为各館分类編目工作不一致，索書号是不可能統一起来的。

上海圖書館編的讀書計劃“培养青年共產主义道德品質”，在著錄事項上是全面的，这样，一看每本書的著錄事項，就可以了解書是什么时候出版的，里面談些什么問題，对自己有沒有帮助。

山东省圖書館編的推荐目錄和讀書计划在著錄事項上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在該館1954年編的讀書計劃第一輯十三个分題中，都沒有著錄出版年、出版地，也沒有提要，有些翻譯的書連譯者也不著錄。如“充實天文知識”这个讀書計劃，共著錄十一本書，其中有六本是翻譯的，而沒有把譯者著錄上去。在“學習中國古典文学”推荐目錄中，共有二十个分題，在第一分題“中國古典文学名著”中共收三十三種書，全部沒有索書号。这三十三本書其中有些如：“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在二至十九个分題中有著錄，但也有很多如“史記”、“文选”“李太白集註”、“杜少陵集註”等書在二至十九个分題中根本就沒有著錄出來。这种不著錄索書号的做法，不僅使讀者無法利用，而館員推荐这些書籍也將束手無策了。如果說这些書山东省圖書館沒有，無法著錄，而編者在編印說明第三條中就說得很清楚：“本書目所收集的資料，以本館收藏的圖書、期刊、報紙为限，圖書均附索書号，以便讀者來館借閱”。而編者在編目錄時，却把“圖書均附索書号”這件事給忘記了。在該目錄里，出版項下大部分是沒有出版年、出版地的，其中有二十種書全部版本項的記載是三个字“通行本”，讀者怎样知道指的是哪一朝、哪一年的通行本呢？

譯者不著錄，讀者就很难知道你指的是那种譯本，如高尔基的“三人”，在1951年就有上海商务和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兩種譯本。又高尔基的戲劇“底層”就有芳信、胡明、李健吾三人的不同譯本。

出版項不著錄清楚更會使人含糊不清，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有胡明譯的1952年和1953年光明書局的本子。又“底層”，李健吾的譯本有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的本子和1953年上海平明出版社的本子。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如果要著錄高尔基的“底層”，只寫“底層”，高尔基作，再加上多少頁，这样，不同的譯本、初版和修訂本在著錄事項上就沒有法子區別了。推荐目錄的著錄事項必須足以使所著錄的書和其他版本的書能够區別，能够充分表明所著錄書籍的特征，在推荐目錄內著錄過於簡單，对推荐目錄是不適合的。

对今后推荐目錄工作的建議：

1. 迅速組織書目協調機構，克服平行現象。在1956年第一次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的报告中，談到設置書目協調機構的問題，这个機構的建立可以加強各圖書館書目工作的联系，克服平行現象和人力物力的浪費，可以加強書目工作的效果。在推荐目錄的編制工作中，平行現象是很嚴重的，在1955年編制“培养共產主义道德品質”推荐書目和讀書計劃的，就有上海、上海市、山东省、济南市、南京、甘肅省等圖書館。各館所根据的資料，絕大部分是相同的，有的書在每个目錄內都可以找到。更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都編了“培养共產主义道德品質”的讀書計劃，上海圖書館還編了推荐書目，兩館都設置在一个地区，而彼此之間缺乏联系，重复編制对象一致的讀書計劃，这种現象是必須克服的。

希望北京圖書館能負起編制指導性推荐目錄的責任，以便各公共圖書館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利用。这样，推荐目錄的質量可以提高，同时，也可以克服各圖書館缺乏編制推荐目錄干部的困难。

2. 各公共圖書館应加強推荐目錄工作，擴大圖書流通，教育讀者。过去一段時間有的圖書館如山东省、上海等圖書館作了很多推荐目錄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有的圖書館如江西省等圖書館從來也沒有注意这项工作，这是值得考慮的。

自1956年圖書館工作會議提出圖書館为科学研究服务后，各圖書館都致力於資料的收集，強調为科学研究服务，对普及工作有忽視傾向。各圖書館編制的推荐目錄已逐漸下降，这是种很不正常的現象。產生这种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对文化部报告中所提出的省市公共圖書館的对象任务理解得不

够全面。省市公共圖書館不僅有收集資料為科學研究的任務，而且也有在人民羣眾中宣傳馬列主義，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的任務。兩方面

都是不應偏廢的。今後省市公共圖書館應重視普及工作，利用書目擴大圖書宣傳，加強對讀者的教育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分類法第三版介紹

馮 虛 生

人大圖書分類法第三版已於八月份出版了。

人大圖書分類法自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一版出版以後，已有很多圖書館相繼採用，並受到全國各圖書館專家和圖書館界熱心的幫助與指導。一九五五年八月出版了第二版（增訂版）。由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文化工作的不斷繁榮，同時在圖書館界對圖書分類工作方面幾年來已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因此使採用人大圖書分類法的圖書館感到人大圖書分類法需要再作一次增訂工作，以適合目前的需要和圖書館工作的要求。人大圖書分類法第三版增訂工作就是在這樣的客觀情況下進行的。

第三版的增訂工作是從一九五六年九月開始至一九五七年初完成，歷時三月有餘，在很短的時間內，匆匆增訂，缺點是在所難免的。現就三版增訂情況向大家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增訂部份

人大圖書分類法第三版主要是對类目普遍加註，指出分書範圍和舉出分書實例，遇有交叉性的类目，則明確規定出分書的辦法，使採用人大分類的分類工作者能一目了然地有所參照，免去在分類時猶豫不決的困難。

在註釋中，有的是屬於理論性的，例如“21 辯證唯物主義”类目註一中註明：“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容，最近哲學家都主張：先闡述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及其基本特徵；後闡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及其基本特徵。在闡述辯證法的基本特徵時其順序為：（一）對立面的統一與鬥爭；（二）量變到質變；（三）否定的否定；（四）闡述哲學各範疇，即現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偶然性與必然性、自由與必然、原因與結果、可能性與現實性等。但目前依照這樣的形式來著述的作品尚少，故本類細目的排列仍未變動。”

但，絕大部份的註釋是明確規定出分書範圍和方法。例如“3（2）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科學”，過去對這個类目應該放些什麼書一直是不太明確的，現在則加以註釋，規定凡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理論研究一般性社會政治問題的評論；階級的起源、定義和階級鬥爭的理論；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領導階級鬥爭的學說；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成功道路的學說、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的學說；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鬥爭方式）；關於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的研究與批判”等書籍都可放入。這樣，就能比較明確地指出了分書的範圍。

對需要詳細註明日期的地方，還指出具體的日期，例如“1232 1903—1904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布爾什維克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派組織的出現時期著作”类目的註釋中具體証明了“1903年7月13日—1904年6月的著作”可放入。

對有些不恰當的类目作了修改，而修改地方最多的是15. 大類（工程、技術）。例如原第十大類中的“1021 中國戲劇”类目下的細目“4 各種戲曲本”已取消，這樣在分類時可避免既按形式又按內容的困難。此外，還充實了原有的类目和延續了必然會實現的預見性类目。例如，“13.10 人類學”原來沒有細目，現在增添了三個細目，即“13.101 人類發生學”、“13.102 種族人類學”、“13.103 人類形態學”。在424 类目下，增加了“4242 第二個五年計劃”类目。

凡原有“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附屬國”字樣，第三版一律改為“資本主義國家、民族獨立國家、反殖民主義國家”，這樣更能符合於現實情況。

第三版在索引部份也增加了篇幅，凡是註釋中可以歸納出來的標題一律搜集在索引內，這樣能多方面反映情況，便於分類。